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魏晋南北朝 诗论史

WEIJIN NANBEICHAO SHILUN SHI

梅运生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三辑）



魏晋南北朝 诗论史

WEIJIN NANBEICHAO SHILUN SHI

梅运生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房国贵
装帧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诗论史/梅运生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2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三辑)
ISBN 978-7-5676-2385-9

I. ①魏… II. ①梅…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5867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魏晋南北朝诗论史

梅运生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28.125 插 页：2

字 数：432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2385-9

定 价：88.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梅运生与夫人于邦敏(右一)



梅运生夫妇2009年5月于中国香港



梅运生夫妇2009年11月于中国台湾



梅运生与安徽师大学报陈育德教授(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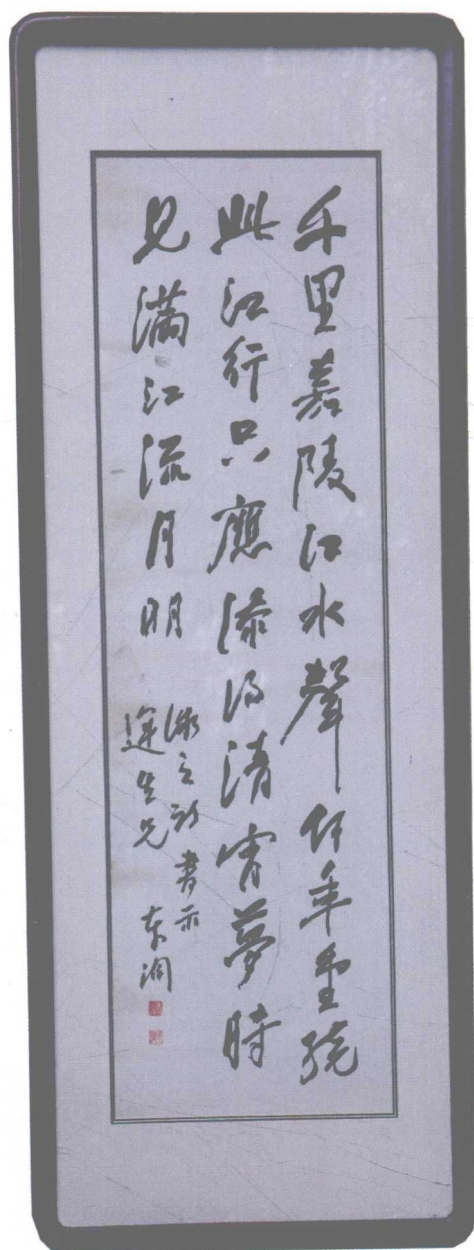
梅运生教授八十寿辰

后排左起:李平,杨柏岭,贾宗普,陶礼天,彭玉平,夏成俊



梅运生夫妇与亲属

左起:梅怡红,王君梅,于邦敏,梅翰云,梅运生



朱东润先生赠言

千里嘉陵江水声，何年重绕此江行。只应添得清宵梦，时见满江流月明。

微之诗，书示运生兄。东润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朱光潜、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项目各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奉献的是第三辑，文集作者既有年高德劭的退休老师，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学科领域涵盖中国文学、语言学、美学、逻辑学等，大致可以反映文学院学术研究风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新变。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序

梅师的这部《魏晋南北朝诗论史》，原为合著《中国诗论史》中的第二编^①，因为相对独立完整，而且除词学研究外，梅师对中国文论的研究主要为中古诗学，毕生心血所得，集萃于斯。是故梅师生前，我们都建议他将之辑出单独出版。可以说，这部《魏晋南北朝诗论史》乃是梅师的代表作，在扎实的文献考辨和已有的丰富研究基础上，厘正廓清了许多存在问题，在总体的学术大判断上，实事求是，以自己的研究所得为裁断，突出强调了中古诗学主要都“尊奉、沿用和发扬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这就与诸多研究论著不同，成为20世纪以来中古文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并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

魏晋南北朝，历来又被史家称为中古时期。《概说》开篇就对其研究的时代、对象及其突出特点略加表述：“自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帝迁都许昌，操朝政，为汉魏易祚之始，下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南北统一，前后凡三百九十三年，史家称之为中古时期。中古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变动的时代，与之相对应的诗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两汉时代的经学附庸一变而蔚成大国，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和繁荣的景象。尤其是诗歌理论批评上所取得的成就，像曹丕的《典论·论文》倡文学批评，陆机的《文赋》论创作过程，开一代风气之先，而具有总结性的泛诗学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具有开创性的评诗专著锺嵘的《诗品》，更是被后人奉为这个领域内‘勒为成书之初祖也’（章学诚《文史通义·

^① 霍松林，漆绪邦，梅运生，等. 中国诗论史[M]. 合肥：黄山书社，2007. 是书上册第二编《魏晋南北朝诗论》，第134—456页，约37万字。

诗话》),后之论诗者也常难以为继。”^①这一时期的文史哲研究,历来为学界关注的最为重要的对象,研究文献的积累,可谓浩瀚;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与锺嵘《诗品》,解析不易,其对后代文论影响尤巨;而从20世纪现代学术研究开端以来,仅就文论研究成就而言,亦是名家辈起,杰著迭出,令后来研究者“也常难以为继”。梅师和我在此说的这两个“难以为继”,皆非虚言,可谓是中古诗学研究的双重难关。是书在近四十万字的篇幅中,包括概说和八章主体内容:曹魏诗论一章,魏晋诗论一章,南北朝诗论六章——其中文笔论与声律说一章、以“南北朝诗论派别的分野”为题分为上下的通论二章,以刘勰《文心雕龙》为“泛诗学巨著”进行独特研究的上下二章,论“评诗专著”的锺嵘《诗品》一章,体制宏大而论述较为完备。虽以诗论为研究对象,但基本上全面关照了中古文论的文学思想与理论批评。《中国诗论史》之长篇《后记》论曰:“中国之所以是诗的国度,不仅因为诗歌本身的发源早,数量多,质量高,还因为诗歌对其他文学体裁,诸如散文、骈文、戏曲、小说等,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和渗透作用,诗歌浸润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诗化的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是一大优点。……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的评论,也是起始最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诗论对其他文体的理论,从概念、范围到一些重要理论命题的形成,其影响也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与西方文论以戏剧、小说理论批评为主体所形成的特点,有明显的不同。因此,抓住了中国的诗论,也就抓住了中国文论的牛鼻子,也有助于登堂入室,探本求源,更深层次进入中国文论。”^②该《后记》乃漆绪邦先生所撰,不过其所论自当为该书三位著者的共同看法;类似论点,梅师也有过表述。如果说《中国诗论史》可以视为一部独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么梅师的《魏晋南北朝诗论史》,就是以“诗论”为主涵盖其余的一部独特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具有鲜明的特点。中古时代,政局上的大变动,导致思想文化上的诸种因缘和合,玄学或曰“新道家”勃然而生,以“道”诠“儒”之法成为一时风气;

① 下文引言,一般均直接用是书的“概说”、章节名。

② 霍松林,漆绪邦,梅运生,等.中国诗论史[M].合肥:黄山书社,2007:1295.

还有道教的振兴和佛教从依附玄学而走向独立并日益中国化的繁盛；而儒家名教仍为“六朝”之纲常，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儒道释三教在激烈的斗争中形成交融会通的思想面貌。自隋唐迄于明清，历代思想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对中古玄学乃至道释二教之影响，置评不一，争议纷呈；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道统并强调这种道统与文统之“血缘”关系者，如韩愈直至宋元明清的理学家与诸多文论家们，致力弘扬儒家诗教传统，对玄学以及道释二教之破坏纲常名教，批判尤烈。20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我国的文化进程和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中，思想文化界与学术界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反传统成为风潮。具体到中古文论的研究上，玄学被视为儒教的反叛，也为学界所关注并致力诠释。尤其是1927年鲁迅先生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后，所谓“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①的论断，多为文论研究界所认可，抑或归因于玄学之功，儒学与玄学关系的研究更加复杂化，学界乃至出现相互对立或差异甚大的诠释，一些论著中更出现将“文学的自觉”之论断，直接变“果”为“因”，作为论析中古文论的先在之理据；而玄学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对“为文之用心”影响较为显著，作用亦大，遂使论者亦或过于强调玄学思想的新变与影响，置仍为纲常之名教于儒学衰敝一语中而多所忽略其思想意义。究竟如何论断中古诗学的主要思想和精神，研究者自可从不同侧重点乃至思想文化立场做出自己的评判，而且具体问题还当具体分析，自亦无可厚非；不过，其中存在一个如何诠释才更为贴切史实的问题。梅师经过多年对中古诗学文献的倾心研究，早在1996年就发表了《士族、古文经学与中古诗论》这篇重要论文，该文最后说：“‘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杜甫在《偶题》中自言其从小就殚精锐思于儒家诗法。当然，这也是从诗的体制立论所作出的概括。所以在这首诗中，他把‘汉道’‘骚人’及‘邛中奇’‘江左逸’都囊括在他所致力学习的儒家诗歌美学传统之内。今之论者，常把诗歌美学排斥在儒家诗学之外，把儒学衰微作为中古诗学兴盛和

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4.

诗论大发展的前提,这符合中古诗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吗?”^①梅师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基本表述了他对中古诗论研究的大判断,不赞同至少在具体的中古诗学上那种主张以玄学思想为主流的论断。这篇论文全部的理论表述也都融入是书的《概说》之中。《概说》考论精谨,基本上反映了是书其后各章研究的主要结论,明确表达了是书的理论构架。本序拟结合《概说》所论,再联系其后各章的具体研究,解读是书的著述大意并结合是书的基本内容略加评述,以之为导读之用。

是书《概说》在论述中国诗学著作体系的建构和分类时明确指出:“是否可以先做出这样的评判:从决定事物性质的主导倾向看,中古时期一些重要的诗论著作,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是尊奉、沿用和发扬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而风、雅体制,正是《毛诗序》中所确立的。《诗经》的毛氏《序》《传》,居古文经学之首。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一些重要诗论家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以古文经学思想为指导的。玄学作为有益的思想资料被吸收,它和缘情、饰采一样,成为这一体系中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儒、玄与这一新的诗论体系的关系,如果借用玄学论争中‘体’‘用’二字来表述,大体上可以用‘儒体玄用’四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梅师是书对中古诗学所作出的大判断的具体表述,是书的著述大意主要在此。

(一)《概述》基本归总了中古诗学的基本内容,分析了门阀士族的兴起、特征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好尚与审美追求等问题,研究了玄学有关名教与自然之争、言意之辨、才性四本论等重要问题,说明了玄学思想对诗学的作用,进而重新检讨古文经学、玄学与诗学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的繁荣与诗体日尊的现象,得出中古诗学“大多数都是尊奉、沿用和发扬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的论断。

关于门阀士族的兴起、特征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好尚与审美追求的问题。《概说》研究指出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一个特殊阶层,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和形成经济实力和政治

^① 梅运生:《士族、古文经学与中古诗论》[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4(3):285—295.

势力很强大的宗族。第二,世积文儒,位居清要。客观分析说:“所谓‘世积文儒’‘人人有集’,所写包括诗赋及经学、玄学、史学、子书等各类著作。玄学的兴起与风行是这一时期最特出的现象,正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何晏等都有专著、专论面世。但士族文士远非一边倒于玄学,注解儒家的经典,也是一大热门,像东海王朗、王肃父子都是以经学名家,王朗‘皓首穷经’,王肃的古文经学,在魏晋南朝时称显学。前引琅邪王筠,自言‘爱《左氏春秋》’,又注《尚书》三十卷。筠先祖王弘,以礼仪传家著称当世。‘世积文儒’就是对此类以经学传家现象的概括。至于对诗学好尚风气之炽烈,更是这个时期士族文士所特有。从名列锺嵘《诗品》的诗人看,仅在南朝时代,陈郡谢氏和琅邪王氏两大士族入品的诗人就有十三人之多,其中多数在上品和中品。像谢灵运、谢朓等,更是彪炳诗史的名诗人。士族文士对诗的特殊好尚,是促进这一时期诗学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强调了士族“世积文儒”的以经学传家现象和对诗学好尚风气。第三,性尚通脱,重视自我。分析指出:“这是某些士族文士习性上的特征。通脱有率真旷达的含意,既表现在行为上,也表现在思想上。就行为言,他们任性而为,兴尽则止,嗜酒吃药,放荡不羁,不拘于常礼。……士族文士重视个人的价值,不愿过多地接受常规礼教的约束,这与士族地主的庄园经济实力强大和政治上相对独立于中央王朝有关。所谓魏晋时代人性的自觉,实质上是士族文士人格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意识的增强,这与汉代儒家章句之学规范下的文士习性是大不相同的。……重视表现自我,这是文学自觉的重要内涵。”又具体指明:“士族地主思想上的通脱,也只是一定程度上摆脱汉代士人对章句经学和常规礼仪的拘泥,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孔教。孔教的核心点是纲常名教和礼乐刑政,这是建筑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士族门阀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也必须依赖名教来维系统治。他们的异端思想不过是将道、释等思想引入孔教之中,或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孔教。新的经学是如此,玄学的本质亦复如此。”第四,侈情与奢华。“这也是士族文士习性上的特征,并进而形成特有的审美情趣。侈情是在情感上率性任真,是通脱在情思领域内的表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正反映一些士族

文士率情任真较为普遍的心态。这与后汉士人矫情和伪饰大不相同,发而为诗,就有‘长于情理’与‘以气质为体’的区别。重视率情、钟情和多情,是中古诗学变革的内在动因。”通过对士族地主的奢华习性的分析后指出:“士族地主这种被服华艳的生活习性,同时也形成了重视华丽之美和秀丽之美的审美心态,由物及人,由人及文,似乎是这种审美趣味发展、演进和相依相存的环链。士族文士品鉴人物,除重视人格美外,同时也非常重视形态美。这是这个时代重视形式美的另一种表现。对男人评头论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极少见的,但在魏晋南朝时却是一种风尚。……中古时代骈文、诗歌和辞赋非常重视词采的声色之美,正是士族文士爱好形式美在文学领域内的表现。”进而得出这样令人信服的结论:“缘情与饰采是中古诗学的两大特征,两大成就,都与士族文士重情与豪华的习性而形成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趣味相关联,而不是玄学或经学的直接派生物。”注重问题的辨析而明其实际是非,再由此升华为理论思考,为是书研究的重要特点。

关于古文经学、玄学与诗学的关系。《概说》论析道:“经学、玄学、钟情与饰采,是构成中古诗学思想和艺术特征的四要素,都缘于门阀士族的思想 and 艺术好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经学。”抓住这四大要素进行分析,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文中特别说明了经学和经学思想的区别,所谓经学,主要是指《诗》《书》《易》《礼》《春秋》及《论语》等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纲常名教之学。“这是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贯穿并渗透在封建制度的机体之中并与之相始终”;而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思想,却发生了多次大变化:“从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到东汉的谶纬之学,是统治汉代的经学思想,属今文经学,到魏晋时则为古文经学所取代。”经学今古文最重要的区分,是对儒家经典解说的思想和方法有别,“古文经学是以通训诂、举大义为研究经书的主要方法,反对今文经学谶纬迷信和繁琐解说。”古文经学兴起后又分化为两大学派:即活跃在南方荆州的宋衷、王肃学派和在中原地区居统治地位的马融、郑玄学派。“郑玄能融合经学古今文的研究成果而集其成,王肃学派宗马(融)反郑(玄),时出新意。他们都发展了两汉的古文经学,是一种新的经学思想。”通过研究分析指出:“把一种经学思想的衰落说成是经

学的衰落,把今文经学的衰落当成儒学的衰落,这是较为流行的观点,但这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又指出:“玄学的产生也是今文经学衰落的直接派生物。这可以从何晏、王弼开创玄学的历程中获得验证。……何、王融合儒道,以道释儒,从儒学中衍生出玄学。所谓‘以无为本’,即以‘无’为万有存在的依据,因而是‘体’,是‘自然’,而万有(包括名教)都是‘末’,是‘用’。根据‘有无相生’‘体用不二’的原则,自然派生出名教,名教则必须法自然。名教法自然,实为一种新的治术,即无为而治,这就为士族阶级相对独立于中央王朝自在自为开拓了空间。”接着对玄学所讨论主要问题——从上述的基本论断出发,进行了分析,也突出强调了玄学乃至佛学的思想方法对中古诗学的深刻作用:其中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客观分析并指明玄学影响下,存在对儒家诗教的背离现象;二是关注并认可佛学思想方法对诗学存在一定的影响。梅师认为:名教与自然之争,一直是玄学论争的中心论题;尤其如阮籍、嵇康的贵无和任自然,常常是和名教相对立,“其‘任自然’的深层含意,是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率性任真的精神自由,即所谓‘越名任心’。反映在诗学上,是‘师心以遣论’和‘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这与儒家诗、乐教化理论是有所背离的。”又如僧肇的《不真空论》,综合贵无和崇有两派的题义,“援佛入玄,他的所谓‘中道论’,实际上就是儒家‘折衷’说的思想方法在佛学和玄学中的具体运用。”特别分析说明:“《文心雕龙·论说》篇批评‘滞有’和‘贵无’两派都是‘徒锐偏解,莫诣正理’,他所认同的似乎就是佛学中这种‘中道’义的。”又指出,玄学对中古诗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很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影响,玄学论争中一些重要论题对诗学的渗透,如言意之辨、才性四本论等,这些分析论述都是细微而深刻的。

关于诗歌创作的繁荣与诗体日尊的现象分析。梅师指出:在缘情与饰采并重的思想作用下,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走向繁荣,其中尤以建安、正始、太康、元嘉和永明五个时代最为兴盛,体现出一种诗体日尊的历史发展趋势,而其时出现的文笔之辨与永明声律论,就是其在理论批评上的反映。除了《概说》简要分析外,正文第三章专门讨论了“文笔之辨和诗的声律说”问题。关于文笔之辨,通过研究说明:“自魏至晋文笔连称日见增多,说明以文